

明示符号理论与欧洲新性别小说

薛 原

内容提要 后结构主义者被认为是一群只负责摧毁、不进行构建的“破坏者”，因为他们相信任何构建的企图都可能让他们重新堕入到形而上学的“圈套”中去。在后结构主义批判一切的风潮过后，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家们渐渐怀疑，后结构主义的思考和分析方法是否还适用于文学的书写和文学作品的诠释。本文通过引入美国人类学和罗曼语学家埃里克·甘斯（Eric Gans）的明示符号理论并分析其与欧洲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后的新性别小说的共通之处，以说明为什么新性别小说无法用其时在文学评论界仍有一定影响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加以读解。

关键词 主体 实物 中心 明示符号 欧洲新性别小说 后结构主义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5.01.004

以性心理和性生理异常的少数人群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在欧洲被称为性别小说。在欧洲文学传统中这类小说向来具有特殊且不可忽视的位置：特殊是指其内容可能与社会的主流道德和价值观有冲突；不可忽视是指这类小说的作者群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都存在，而且广为人文学界各个邻域关注和研究。近年来，在欧洲文坛这类小说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逐渐进入主流文学。这一文学流派渐成气候，与人文学界的两个重要变化有关：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曾在批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中起主导作用后结构主义渐渐衰落，直接导致人文思想各个领域研究重点偏离语言^①研究；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成名的美国后结构主义性学家朱蒂斯·巴特勒的“异性恋霸权论”到 90 年代末形成体系，^②虽然曾为诠释此类小说的圣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的适用性遭到越

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此后的性别小说走出上述禁锢，其视角和内容焕然一新。这些小说不再能或不完全能用后结构主义理论诠释。所以，本文将需要用新理论解读的性别小说称为新性别小说。

一、甘斯的明示符号

当性别小说悄然变化的同时，学者们开始探索用新的哲学方法诠释人文思想领域中的现象，由此产生了新的语言符号概念。笔者认为，美国人类学和罗曼语学者埃里克·甘斯^③是其中集大成者。甘斯在扬弃后结构主义的符号概念之后，提出了的全新明示符号（ostensive sign）概念。

甘斯的明示符号产生于后结构主义衰落之时，因此，在阐述甘斯的明示符号之前，有必要对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做一个简单回顾。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

雅克·德里达提出“解构”理论，被尊为后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本文相关的三个重要观点分别是：一、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物”，^④即语言学称之为指示物或实物的东西，只不过是另一个文本。意义的产生与真实的存在相分离，只依赖于语境中的符号的相互关系。意义是以“不在场”为前提的，意义本身因与其他意义的差异而得到标志。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比如，只有当人们了解什么是黄色或蓝色时，才能够为绿色定义，而符号学中绿色究竟是什么，也不对应现实中某一固定存在的颜色。所以，语言中的能指，即读音和字形，继续指向能指。语言中的所指，即概念和意义，则不间断地变成能指。语言符号失去了终极的内容和意义，构成一条条连绵不断有独立运行规则的能指链条。^⑤二、德里达虽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宣称主体死了，但他认为不确定意指关系中的能指代替了主体的作用，主体失去了自笛卡尔^⑥以来在认识领域的特权和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⑦⑧}三、德里达试图终结任何形成中心和固定结构的可能性，以及随这些中心所产生的存在与在场的概念。^⑨巴特勒与德里达两人的符号概念大同小异。巴特勒解构妇女这个词的同时，也解构了抹灭了同性恋等少数性别人群的差异和性诉求的异性恋霸权。巴特勒认为，妇女这个词（能指）并不对应任何本质的物质的女性特征（实物），对于什么是妇女没有统一的概念和定义（所指），除了真正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以外，双性人妇女、变性人妇女以及同性恋妇女，都只是妇女这个语言符号的变体。这样一来，妇女这个词的意义被无限扩大了。巴特勒认为性别主体消解在不确定的能指链条里，以解构可以清楚地被界定、被归类的男女二元性别主体。^⑩巴特勒也借此解构了本质主义，即生理性别先于并决定社会性别。简言之，上述后结构主义者都主张实物和主体的消散以及中心解构，这使得后结构主义

的诠释方法流于程式化，其理论失去了对有着细腻丰富文学语言和深刻思想内涵的文学作品的诠释能力。

人类学家甘斯的明示符号理论是对后结构主义的诠释方法的一种颠覆。从明示符号产生的基础看，甘斯认为，人类的文明起源于最初的“欲望”。比如，在社群中的原始人的矛盾主要源于对实物，即对食物、遮蔽场所和性交对象等等（下同）的欲望。欲望在社群中可以被模仿，因此具有“传染性”。当一个原始人发出声音或用手势指向某个实物表示占有意向的时候，这个行为很快被其他原始人模仿并迅速传播。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模仿被模仿者的意向，渴望得到实物，结果，每个人都将他人视为实现欲望的阻碍。当所有人都有占有实物的欲望时，暴力就可能会发生。而其中一个模仿者意识到没有人可以不冒生命危险独占实物的时候，他便将对占有实物的意向手势的模仿逐渐演化成对实物的模拟和抽象。这一行动被大多数人认可，继而被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则称其为明示符号。由此可见，明示符号产生于对实物的模拟和表达，结果是暂时分散和延迟了人们对实物本身的注意力，缓和了由无区别简单模仿带来的一触即发的暴力。但是，由明示符号带来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它能延缓欲望，但毕竟不能取代实物本身，很快人们将重新陷入欲望无法被满足的愤怒中去。所以明示符号能延迟暴力，却不能解除暴力。无论是在甘斯理论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对实物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当新的欲望和矛盾产生的时候，也是人类群体创造新的明示符号的时候。明示符号的产生以真实的存在为基础，建立在人类的生存欲望上，所以注定与人类的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文明息息相关，有很强的读解文学作品的能力。

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看，明示符号的颠覆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明示符号是直接指向实物的符号，所以符号和实物是一对一

的关系,只有在看到实物时,才明白符号的指向。相对于后结构主义符号系统中开放的、不确定的、延迟的意指关系,明示符号则是一个封闭的、固定的、在场的符号整体。第二,明示符号强调主体和实物之间的联系。人通过对实物的模拟、投射、抽象和表达,重新成为创造和传播符号的主体。第三,甘斯提出了新的边缘和中心关系。这里需要提到,后结构主义语境下的中心和边缘关系是,相对于一个需要被解构的霸权中心,被压迫者往往是被边缘化的绝对弱者。^①与后结构主义去中心化(例如去霸权中心)的倾向不同,甘斯用明示符号重建中心。为了解释明示符号在人类群体取得中心位置的原因,甘斯在他的理论中吸取了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替罪羊理论”的精华。吉拉尔认为人类文明的起点是集体对处于暴力中心的“替罪羊”的谋杀,之后集体怒火被平息,矛盾得以缓或消除。“替罪羊”获得大众的同情,最后可能被神化。吉拉尔借此解释基督教起源:耶稣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他为救赎人类的原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甘斯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觊觎同一个实物时会导致矛盾,甚至暴力升级,而实物处在这个暴力的最中心。如前所述,明示符号的作用在于缓解人类群体对实物的欲望,从而推延矛盾的发生。既然无论是“替罪羊”还是明示符号都具有缓解矛盾的作用,那么处于暴力中心的替罪羊被神化,处于暴力中心的实物(明示符号)也会被神化。甘斯的明示符号和吉拉尔“替罪羊”理论异曲同工。历史也证明,从原始社会至今,能够缓解矛盾的人和物都可能被神圣化。比如,中西文化中的神很多都是从人经历了自我牺牲后变成神;图腾崇拜则是最原始的实物崇拜。所以,明示符号还关联了两个领域,即人类世俗的物质社会与神圣的、升华的意识领域。

从文学研究和评论的角度看,甘斯的明示符号对诠释新性别小说意义非凡。甘斯赋予实

物以至高无上的中心位置,而创造符号的意向性主体也借此强势回归。假如处于中心的是一个性别特异的主体,那么这个性别特异的主体构造既是众人欲望的焦点也是矛盾的源头。作为主体的人通过一系列思维活动,建立与实物的联系,创造出明示符号。虽然明示符号最终不能解决矛盾,但作为符号载体的性别特异的人有可能拥有神的特征或神的力量,被大众所模仿,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范本。众所周知,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下,试图寻找意义、本原和中心的主体往往身不由己地被引向更多的能指链条,迷失在无止境的符号世界里。而甘斯理论中的主体可以从明示符号或从符号载体身上找到中心,实现自我成长和精神升华——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主体重建。相对于后结构主义的符号概念,明示符号对实物和主体的构建有助于务实地解决与少数性别特异人群切身相关的生理、心理和生存状况问题,在表达少数性别人群的诉求方面有其明显的优势。而且明示符号并没有脱离符号语言学的范畴,其适用范围更为宽广。

二、明示符号与欧洲新性别小说

作为罗曼语言学家的甘斯,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欧洲哲学,特别是欧洲文学成为明示符号产生的沃土。所以,甘斯在人文思想领域的探索及研究成果与当代欧洲新性别小说的书写不谋而合。本文选用的两部小说均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在欧洲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她们的作品与甘斯的学说相互印证,是巧合,也是必然。

下文将以波兰女作家奥尔加·图卡曲克(Olga Tokarczuk)创作于 1998 年的小说《白天房子,黑夜房子》为例,应用甘斯的理论来分析明示符号产生的前提、过程和在小说中的作用。这部小说将一个不被基督教承认的有男女两性特征的悲苦圣女作为叙事的中心。小说的叙事者在德国与捷克交界的一个小镇上偶

然发现了悲苦圣女的雕像——这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长着胡子、裸露上身的少女。出于好奇心她希望能了解这个奇怪雕像的来源，于是找到了一本由修士帕夏里撰写的关于悲苦圣女传说的小册子，里面记述了悲苦圣女与其穷兵黠武的男爵父亲之间的悲剧。长年在外征战的父亲有一天发现从小住在修道院的女儿长大了，而且美貌惊人。父亲决定将她嫁出，以换取效忠的同盟。这显然是违背女儿的意愿的，长期与世无争的清修已使她决定皈依上帝，济世助人。她被囚禁数月，在最终被强迫嫁给一位爵士的那一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脸上覆满了丝绸般的胡子，头发垂到了肩头。褴褛的衣衫无法遮掩她年轻的、少女的乳房。她那深沉的、温柔的目光扫过那些好奇的围观者的脸，终于落在男爵的身上。人群开始比划十字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跪倒下去。悲苦圣女，不管她现在变成了什么，举起了手，好像是要环抱住她前胸。接着她以一种平静的语调说：我主解救了我，并赐予我他的脸庞。^⑫

这一段引文叙述了悲苦圣女在父亲的威逼之下，祈求上帝的解救，成为了上帝的化身。她得到上帝之脸（胡须）与上帝合体，从此无人能够觊觎和利用她的美貌。从引文可见，圣女（指悲苦圣女，下同）的赤裸的乳房是作者书写的重点，也是小说中众人瞩目的焦点。无论是垂涎她美貌的爵士，还是对想用她交换盟友的父亲，圣女或者说她的乳房在俗世里是被渴望的对象。上帝的胡须维护了圣女的清白，暂时推迟了矛盾的发生。但由于圣女与上帝合体，她的身体呈现出非男非女的状态。这是对男权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女儿和妻子的角色的反抗，却引发了她与外界新的、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即让他人的欲望落空，最终导致暴力。圣女被认定是恶魔附体，被钉死在十字

架上。在这个故事里，圣女的乳房和胡须处于小说中的欲望和矛盾的中心。拥有两性特征的圣女从推延矛盾发生，再引发新的矛盾，直到被处死，平息矛盾，印证了明示符号产生的前提是欲望的不可满足；明示符号的作用是暂时缓解矛盾。当矛盾再度爆发时，作为符号载体的圣女，最终被牺牲，也因此被神化。

在小说的另一个故事中，修士帕夏里通过明示符号完成了自我主体的重建。帕夏里被送到修道院成为塞莱斯廷修士的情人之前是一个贫农家庭里的二儿子。作为交换，塞莱斯廷许诺在物质匮乏的修道院里为帕夏里在厨房谋一份闲职。半推半就之间帕夏里服从了塞莱斯廷，而不伦之恋的罪恶感却一直让他倍受煎熬。帕夏里罪恶感不仅仅来源于同性孽情，更是来源于他对自己性别身份的困惑：他非但不认为女人是罪恶的源泉，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女人。当帕夏里委婉地向塞莱斯廷倾诉自己对女性性别的憧憬时，塞莱斯廷误以为帕夏里借此拒绝他们的同性关系，于是塞莱斯廷告诉帕夏里，亚当因夏娃的愚蠢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人类因夏娃而背负了原罪，而我主耶稣为赎全人类之原罪，将十字架背在身上，最后被钉死在上面。追根溯源，夏娃这个女人是罪恶的起点。听了这番话，帕夏里只能压抑自己的诉求。

直到塞莱斯廷暴病而亡，帕夏里连夜逃出修道院。病饿交加的夏帕里阴错阳差地被送到修女院，他向修女院院长坦诚自己的一切“罪孽”，希望能得到宽恕和心灵的平静。院长并没有尝试用语言宽慰帕夏里，而是直接将他带到了圣女的画像面前。帕夏里立即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了：在祥和庄严的耶稣基督长满胡须的脸庞下面是处女的赤裸的乳房。帕夏里完全不排斥这个看似荒谬的组合。他认定画中人虽然长满胡须却是个女子，而这个女子和自己有着相似的命运——“他终于明白他跪在一个像他一样的生灵面前。虽然她和他一样，公然地

违反自然。上帝之眼却如此温和而忧伤地注视着他。那只是出于爱。”^⑬这一刻，帕夏里通过一系列思维活动与圣女画像建立了联系，他成为构造明示符号的主体，赋予了一幅普通的画像以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一边将自己内心隐秘的、对女性性别的憧憬或模拟的愿望投射在圣女的乳房（实物）上，一边将他对神的憧憬投射在上帝的胡须（实物）上。上帝将胡须赐予圣女，向世人昭示了他对她的爱，而这爱博大到足以包容一个非男非女的异类。这个启示当然来自于帕夏里对圣女画像的个人理解，也就是他对实物的抽象——圣女既是女人也是男人，是处女也是基督耶稣，是母也是父。圣女的乳房代表了人的欲望，而基督的脸孔则暗示了神性，两者在圣女的身上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对帕夏里来说也意义重大。他的原罪——他与塞莱斯廷的不伦之情和他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女人的愿望——与他渴望接近主、甚至与神合体的愿望是相互冲突的，但人神合一的画像给帕夏里找到一个以他的带罪之身仍然能够亲近上帝、感受上帝仁慈与宽厚的理由。帕夏里由罪恶感引起的矛盾得以缓解。

帕夏里决定对圣女的身世进行考据，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开始模仿和内化圣女的品性和追求。他希望圣女的故事能打动天主教会，这样他的女性身份才可能被认可。而在这之后，他希望能够回到修女院，在那里过一份平静的与上帝为伴的生活。当他完成书稿面见主教的时候，对方推诿之辞让他失望。帕夏里最后选择自杀，但他已经完成了自我救赎。圣女画像在这里是促使帕夏里精神升华的中心，是使他的心魔得到疏解的明示符号。

以 2002 年德国小说家乌丽克·德莱斯纳（Ulrike Draesner）的小说《嫁妆》为例，笔者将同时分析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不适用于此类小说的原因。女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位于家庭和社会矛盾中心的性别异样的双性人安妮塔。只有家庭成员知道安妮塔曾是双性

人，后来通过医学手段变成女人。小说的前半部分着重叙述了安妮塔“病态”身体的改造过程中家庭成员所经历的困惑。这个共同的“秘密”使得父母在相互埋怨和争吵中走向婚姻破裂，而姐姐阿洛伊在缺乏关爱的成长环境中形成自闭型人格。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出人意料地将具有病态两性特征安妮塔塑造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也成为了欲望聚集的中心——众人羡慕的对象和男人们追逐的目标。姐姐阿洛伊的噩梦由此开始。安妮塔的相貌混杂了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仿佛是一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充满吸引力。“安妮塔的美展示了什么才能称之为男人——是男人也是女人或者说是两者兼有。”^⑭安妮塔的性格也同时兼有男性的决断和女性的温柔，这使得她无论在情感和事业上都无法无往不胜。在这部小说中，原本在巴特勒“异性霸权论”的定义下处于不可分辨的边缘位置的少数性别异常之人被置于中心。相比之下，生理正常的阿洛伊在妹妹安妮塔的光环下反而处于边缘和弱势，充满了自卑感。阿洛伊觉得自己是分裂的、不完整的，她甚至认为正常的身体才导致了自己的平庸。当安妮塔独特双性之美引起了阿洛伊男友卢卡斯注意的时候，阿洛伊把安妮塔当作爱情上假想敌，希望通过节食来模仿安妮塔，用消瘦的身材迎合社会的审美标准。而这一努力却使阿洛伊更深地陷入到性别角色的错乱中去。作为女人的她无法获得男友的亲睐也不能怀孕，安妮塔却顺利地结婚生子。在得了厌食症被送进医院以后，阿洛伊失去了女性生理期，整个身体出现了男性化特征，无论在心理和社会角色上都很难以迎合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由此可见，在这部小说里，“正常”与“非正常”，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发生了颠倒，这使得以解构霸权中心为前提的后结构主义的诠释方法不适用了。

直到有一天，安妮塔告诉阿洛伊她也厌倦了世人给她设定的人生模式。因为无论是乖巧

的女儿还是美丽的人妻，都与她的真实自我相去甚远，安妮塔认为自己其实既不是女也不是男，她决定停止服用女性荷尔蒙以还原身体本来状态。这个决定使安妮塔成为男女两元社会的异类，她最终被自己的丈夫杀害。在安妮塔死后，已经不在这场家庭悲剧里的局外人卢卡斯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确实，这是一个事实，安妮塔生来就有一个过大的类似阴茎的阴蒂……，但是，仅仅根据这么一块多余的肉……却生出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对此你们如此讳莫如深，直到这个小小的事实在现实中着了床，接着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泡，将你们都包围起来了，当然你也在其中，我亲爱的（阿洛伊）。这是一个波希米亚式的家庭悲剧。^⑮

德国学者卡塔尼认为“这一块多余的肉”深受“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是通过“想象和诠释”等一系列话语形式而造就的。^⑯这是典型的巴特勒理论的诠释角度，即主张将身体（实物）消解在符号链条中以对抗本质主义，强调社会文化中处于霸权地位的话语在塑造主体和性别身体中的决定意义和解构这些话语的必要性。上述读解方法明显忽略了女主人公阿洛伊与处于中心位置的明示符号载体的安妮塔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对小说中的重要细节的诠释失去了针对性。作者借小说中安妮塔之口对后结构主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我也知道那些新观点和有关身体的理论，我知道巴特勒、福柯、巴特和整个由后现代带来的涤荡。他们大可以在这些理论中来回穿梭，自娱自乐。对于我而言一切很简单，洛洛（阿洛伊的小名），我只想要我的日常生活。”^{⑰⑱}毕竟少数性别异常人群的生活不仅仅是语言符号或话语。巴特勒等人的后结构主义诠释方法虽然能够揭示霸权话语对少数性别人

群的压迫的实质，但很快就陷入到“一切都是话语”^⑲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危机中去，很难解决性别异常人群的切身问题。

相反，明示符号对实物（身体）和主体的构建，弥补了巴特勒理论在诠释此类小说时的盲点。就这部小说而言，安妮塔特异的身体成为欲望的焦点和矛盾的中心。不仅仅是阿洛伊，小说中所有相关人物都有将自己欲望或是愤怒投射在安妮塔特异的身体上。因此安妮塔的身体是典型的明示符号，它引发了性别正常人群和非正常人群之间的连锁危机。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不自主地被卷入到一系列漩涡般的悲剧性事件中去。对阿洛伊来说，安妮塔的角色始终在弱者和强者中置换“她（安妮塔）悬坐在中间，既是中了魔法的人又是魔法师；既是阳光女神又是替罪羊。”^⑳一方面安妮塔是绝对的弱者，自小就没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当她决定走一条与他人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时，却被杀害。另一方面她在医学角度上被认定为畸形的身体反倒使她跨越性别的界限甚至超越了凡人的美，散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成为成功人生的典范。阿洛伊始终不能确定，妹妹的完美是否真正源于这个需要通过强制手段修正的病态的身体构造。阿洛伊对安妮塔的美的感知无疑也被这个畸形的身体构造阻碍了。阿洛伊的注意力在妹妹特异的身体构造和对完美的定义之间反复摇摆，这符合甘斯对明示符号的描述：明示符号能延缓欲望，但毕竟不能取代实物本身，很快主体将重新陷入欲望无法被满足的愤怒中去。阿洛伊在对安妮塔的“完美身体”的肯定和质疑中痛苦得不能自拔。

处于矛盾中心的安妮塔最终沦为疏解矛盾的出口，她的死终止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暂时缓解了小说中的社会对性别异常人群的厌恶和仇恨，并引起了读者的思考。小说的题目《嫁妆》“Mitgift”是一个暗喻主题的“文字游戏”。这个词的词根“Gift”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毒药，而在英语中却指的是礼物或天赋。安

妮塔的特异身体对阿洛伊来说具有两面性。它是阿洛伊自我认同危机的根源,阿洛伊因此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毁灭。同时,阿洛伊的认识和超越自我的契机仍是妹妹安妮塔雌雄同体的身体。阿洛伊自安妮塔死后,在反思中成长:她放弃通过改善外貌和未婚生子取悦男友卢卡斯企图,全身心投入到她所热爱的摄影事业中去,从中找到了自我价值,并在拍摄宇宙星系图谱的时候得到了启示“从那些可以想象的(宇宙的)边界,有一部分物质升腾起来了,于是从前那些无法想象的部分也明晰起来。”^②这一部分物质所起的作用让人联想到安妮塔的特异身体构造在阿洛伊成长过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它阿洛伊了解了她自身的潜在欲望、情感和潜能。阿洛伊的精神升华了:在感慨宇宙恢宏巨大的同时,妹妹身体给她带来的人生困扰迎刃而解,她最终战胜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三、新性别小说的影响和意义

不难看出,以上两部小说从内容和精神内涵来说已经不能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去诠释,^②却处处与甘斯的明示符号理论相印证。新性别小说在学术界的影响在于,将被认为是违反常理或是有“病态”身体构造的人置于叙事中心,这种突出甚至神圣化特殊身体构造的倾向,使得所谓畸变的身体构造不再是小说中被隐讳的主题。此外,新性别小说作者结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很多性学问题的合理性,为维护性心理和性生理异常的少数人群的利益找到科学依据,使他们最终得以拥有与正常人一样的权益。受其影响,社会学家认为,后结构主义的诠释方法虽然使得人们深刻反思了历史和文化等宏观话语对少数性别特异人群的压迫,但却无法帮助少数性别特异人群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生存状况,争取政治和宗教权益。越来越多的学者推动哲学从语言研究转向人类学研究,^③重新将人而不是语言作为研究

的中心。文学评论家们则吸取和延伸这些研究成果,用来更加准确地解读后结构主义以后的小说中出现的新内容和新内涵。^④

少数性别异常人群在新性别小说中从边缘到中心的变化,体现了这一特殊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这一变化与左派文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在欧洲文学界影响力持续扩大有关(欧洲的左派特指倡导社会革新与平等的、相对于社会保守势力的社会势力)。左派文人普遍同情社会弱势群体,认为文化融合是保证战后欧洲多元化移民社会安定的前提。除左派文人外,自 1968 年欧洲左派学生运动和女权运动以后,一部分女权主义活动家们在实现了一部分自我政治诉求、大大提高了自身社会地位之后转而同情更为弱势的同性恋群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性别小说中往往也包含女权主义诉求。这两个群体也不约而同地关注文学领域的新思潮,参与社会少数性别人群文学形象的书写。他们创作的小说从小众文学现象变成文学主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美国作家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小说《中性》获 2002 年普利策奖。小说记叙了一个双性人在民族和国家的宏观话语的洪流中坚持自我的故事。在欧洲,德国女作家卡琳·施密特(Kathrin Schmidt)的小说《你不会死》获得 2009 德国图书奖。该奖代表了德国当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将一个变性人塑造成道德完人,在生活中践行基督教博爱的精神实质,成为具有神的特征的人。由此可见,对于少数性别人群的书写在欧美主流文坛不仅是方兴未艾,甚至可以说已成气候,引领着欧美文学的新思潮。

注释:

- ① “语言转向”是指 20 世纪西方哲学偏离传统哲学的一系列发展方向,其共同点在于认为语言不再是了解和沟通现实的媒介,而是思维的毋庸置疑的前提条件。正因为

- 人类的所有知识都由语言来建构,超语言的现实是不存在的,或至少是没有语言就不可能达到的。这意味着西方哲学整体向语言批评转换“语言转向”对20世纪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影响深远。参见 Ansgar Nünning, *Metzler-Lexikon Literatur- und Kulturtheorien* (Stuttgart and Weimar: J. B. Metzler, 2008), 424 页。
- ② 李银河 《女性主义》,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115 页。
 - ③ 埃里克·甘斯生于1941年,现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语系。甘斯理论内容丰富,脉络复杂。本文只涉及其论文的一个核心部分,无法在有限篇幅内反映其理论的全貌。笔者在此引用的文献主要是 Eric Gans, *Signs of Paradox: Irony, Resentment, and Other Mimetic Structur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6 页。著作颇丰的甘斯于80年代提出生成人类学 (Generative Anthropology), 系统总结了从古典到后现代的西方文化发展历程。
 - ④ Jacques Derrida, *Grammatologie*, trans. Hans-Jörg Rheinberger and Hanns Zischler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4), p. 274.
 - ⑤ 尚杰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载江怡编 《当代西方哲学演变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309-313 页。
 - ⑥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认识论哲学的起点,奠定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核心地位。
 - ⑦ 意向性概念是胡塞尔现象学中最关键的概念。意向性既意味着意识构造客体的能力,也意味着意识指向客体的能力。
 - ⑧ 尚杰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312 页。
 - ⑨ 尚杰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305 页。
 - ⑩ Judith Butler, “Contingent Foundations: Femi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Postmodernism’”, *Feminist Contentions: A Philosophical Exchange*, eds. Benhabib, Seyla et al., trans. Katharina Menke (Frankfurt a. M.: Fischer, 1993), p. 50.
 - ⑪ Raoul Eshelman, *Performatism or The End of Postmodernism* (Aurora and Colorado: Davies Group Publishers, 2008), p. 17.
 - ⑫ Olga Tokarczuk, *House of Day, House of Night*, trans. Antonia Lloyd-Johns (Evanston and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3. (笔者译文)
 - ⑬ Tokarczuk, *House of Day, House of Night*, p. 85.
 - ⑭ Ulrike Draesner, *Mitgift* (München: Luchterhand Literaturverlag, 2005), p. 217.
 - ⑮ Draesner, *Mitgift*, p. 214.
 - ⑯ Stephane Catani, “Hybride Körper. Zur Dekonstruktion der Geschlechtsidentität in Ulrike Draesners Mitgift”, *Familien, Geschlechter und Macht. Beziehungen im Werk Ulrike Draesners*, eds. Stephanie Catani and Friedheim Max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8), p. 93.
 - ⑰ Draesner, *Mitgift*, p. 359.
 - ⑱ 该引文中提到的后现代可以视为是对后结构主义的一种模糊和宽泛的称谓。
 - ⑲ 对比, Karin Ludewig, *Die Wiederkehr der Lust. Körperpolitik nach Foucault und Butler* (Frankfurt and New York: Campus, 2002), 38 页。
 - ⑳ U. Draesner, *Mitgift*, p. 228.
 - ㉑ U. Draesner, *Mitgift*, p. 240.
 - ㉒ 典型的以后结构主义性学理论为蓝本创作的性别小说有英国作家杰可·凯 (Jackie Kay) 1996 年的小说《小号》和 1998 年的德国作家托马斯·迈内克 (Thomas Meinecke) 的小说《假小子》。前者将有变性倾向主人公定位为社会的受害者,后者将社会语言和文化话语的决定作用放在小说的核心位置,情节和人物塑造则退居二线。
 - ㉓ 除甘斯以外,德国法兰克福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罗伯特·古古泽 (Robert Gugutzer) 编著有 *Body Turn. Perspektiven der Soziologie des Körpers und des Sports* (Bielefeld: transcript, 2006), 主要研究身体和精神升华的关系。
 - ㉔ 德国慕尼黑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劳尔·艾什曼 (Raoul Eshelman) 扬弃甘斯理论,在其著作 *Performatism or the End of Postmodernism* 中独创出表演主义理论,用框架和场景等概念来解释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之后文学,电影和建筑等领域的新现象。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德语系)

责任编辑: 何 卫

英文提要

Addison Gayle: The Exponent and Defender of the Black Aesthetic

WANG Yukuo

The Black Aesthetic , spurred by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Black Arts Movement , flourished in the early 1970s , and has produced an impact on various black American writers and critics. As the editor of *The Black Aesthetic* , Addison Gayle inherits the past tradition and breaks new grounds for the future; his advocacy of the black aesthetic maintains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 providing rich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Black American writings and criticisms.

John Stuart Mill's Discourse of Knowledge

GAO Xiaoling

As a seminal Victorian intellect , John Stuart Mill exerted widespread influence over diverse fields , such as politics , economics , and ethics. Mill studies have been mainly concerned with his contribution in particular disciplin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Mill's discourse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professional details in order to obtain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his thought. Taking “many-sidedness” and “half truth” as his basic principle , Mill differentiated “general knowledge” from “superficial knowledge”. Based on the former he advocated “general education” befor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philosopher-poet” as the intellectual authority. Reductive sectarianism fails to show Mill's mental strength. Eclecticism and anti-sectarianism demonstrate his synthesizing efforts in the sweeping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Jane Austen's Biographies: Recent Development

GONG Yan

Earlier major biographies of Jane Austen were written by her family members , the main outlines of the novelist's life and personality being all there in Austen-Leigh's *Memoir*. Deirdre Le Faye's *A Family Record* came out in 1989 , a most meticulously accurate account , making not only the use of family papers , but also drawing on research of her own into parish records and county archives. Since then several more full-scale biographies have appeared , either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inclusive and all-embracing social history or turning to literary psychoanalysis for a much less conventional figure of Jane Austen. With the burgeoning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 her current biographers are juxtaposing novel-reading ,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 presenting a more lively version of Jane Austen , and producing a variety of invaluable appreciations of her fictional world.

Back to the Center: The Ostensive Sign and New European Fiction of Gender

XUE Yuan

Poststructuralists are often considered to be “destroyers” who destruct but do not construct. They

believe that any attempt to rebuild will cause them to fall back into the “trap” of metaphysics. Nowadays, many writers, literary scholars and critics are beginning to wonder whether the poststructuralist way of thinking and its analytical methods can still be applie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y try to find new methodologies, open up new territory in the fields that poststructuralists abandoned, and infuse new spiritual content into old materials. A focal point of their work is the study of new concepts of corporeality and centering.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the ostensive sign developed by American cultural theorist Eric Gans. It will also apply these theories to new modes of gender construction in selected European fiction since the late 1990s and explain why a post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se novels.

Two Master Dramatists: In Memory of Marcel Pagnol and Sacha Guitry

ZHU Xiaojie

In the 1930s, the birth of sound film ushered in a new age of the marriage between drama and film and a golden age of French cinema as well. Marcel Pagnol and Sacha Guitry, two famous dramatists, created classic pieces in the history of films with their profound stage experiences and innovative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and were widely acclaimed as two master dramatists. The present paper, in a chronological order,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two dramatists with regard to their experience of making films, film language, chronological and spatial factors and style of their works, analyse their respec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film art, and finally reflect 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dramatized film”. The year 2015 is the 12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Pagnol and the 130th of Guitry. The paper is therefore an tribute paid to the two masters.

Feminist Spatial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of Gaskell's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Mary Barton

FAN Yiting

Gaskell, among other early and mid-Victorian novelists, addresses women's access to industrial, urban and legal spaces to mediate class conflicts and economic struggles. By focusing on body politics and feminist agency of Mary Barton, the titular heroine of the novel, this paper seeks to study the novel by way of Marxist space analysis. With such spatial adventures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 heroine not only transforms herself from an individual consumer to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proletarian class consciousness, but represents the novelist's gendered 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a Lukácsian recuperation of proletarian image as a whole.

Appropriation and Transvaluation: Proba's Cento from Virgil

GAO Fengfeng

The cento composed by Proba in the 4th century is a patchwork consisting exclusively of lines and half-lines taken from Virgilian corpus, and it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Genesis and gospel narratives. The paper begins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f cento as an ancient literary genre, focusing on its salient features